

博物视界

云冈石窟第一〇一窟西壁的粟特商队画

丝路旅人 文化使者

武夏

始建于5世纪的云冈石窟,是中国乃至世界石窟艺术史上的经典,记录下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历程。在云冈石窟中部区域,北魏皇家洞窟第16窟的前壁东侧,有一处凸出于壁面的小窟(编号为第16-1窟),开凿年代在5世纪末北魏迁都洛阳前后。驻足仰望,可以在西壁上层发现一支由5名商人和两匹驮马组成的域外商队。东汉以降,中亚商人经由丝绸之路大量东来,贸易活动及文化习俗与中原文化交融,影响深远。通过这幅画面,我们可以遥想北魏时期东西文化交流的灿烂景象。

云冈石窟中的“粟特商人”

佛教石窟中,商队题材大多表现释迦成道后商人供奉佛陀的场景。在第16-1窟这幅佛龛左侧的商队画面(见右图,云冈研究院供图)中,5名商人头戴尖顶帽,身穿窄袖长袍,腰部系带,双手合十,纵向排列,似错落跪于佛龛一侧。这些商人样貌各异,上方第二名商人深目高鼻,面颊清瘦,蓄长髯,目光看向前方。其余4名商人或目光低垂,或望向前方。画面下方雕刻阿四向前行进的马匹,背驮货物,右足抬起,动态十足。这些商人与传统中原人物的样貌、穿着明显不同,应是《北史·西域传》所记“深目、高鼻、多髯,善商贾”的西域商人。这样的场面,在云冈第12、17窟中也有发现。

在西域诸国中,粟特人以善于经商闻名。粟特位于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珊河流域,大约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地处欧亚大陆交通枢纽。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令粟特人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贸易者,推动中原与西域交流互动。十六国以来,粟特商人曾活跃在凉州(今甘肃武威)一带。太延五年(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平定北凉后,粟特商人及亲属西人一起迁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从商人的形象及文献中对粟特人善于经商的记载来看,这支商队或许便来自粟特。

云冈研究院研究员赵昆雨指出,除了这支西域商队,第16-1窟一些造像的佛衣也借用了粟特贵族的“翻领式”披覆方式。如西壁上层龛佛像的佛衣胸前缘为对称的三角形翻领,东龛坐佛佛衣为双肩翻领式,北壁上层中央龛内交脚菩萨的披帛也为翻领式。这样一様式在佛像、菩萨像服饰中非常少见,多见于中亚地区噶哒或粟特贵族的服饰。

艺术创作源于现实,从这些迹象来看,西域商队在5世纪中叶已来到平城,在当时的皇家石窟寺中留下印迹。

丝路贸易繁荣的见证者

西域商队主要通过西北地区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商人们长途跋涉,沿途历经艰难险阻。为保运输顺利,商队往往由多人组成,甚至有几十至数百人的规模。但小型商队也不鲜见。一则唐代吐鲁番文书中,记载着外商追讨丝绸诉讼的经历,其中商队就由两头骆驼、四头牛和一头驴组成,这与云冈石窟第16-1窟描绘的商队规模相近。

西域商队的图像广泛出现在丝路沿线的石窟中。在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的克孜尔石窟,最早开凿的第38窟有一则“商主燃臂引路”故事画:阎浮提500名商人行路经过一段黑暗的山谷,商队首领用白布缠臂,浇上酥油,点燃双臂照亮道路。画面中可以看到中间举起双臂的商队首领,以及两位头戴尖帽、身着窄袖长衣的西域胡商与驮物的骆驼。敦煌第296窟顶部绘制的《福田经变》故事画“安设搭桥”中,桥梁两侧分别有牵着骆驼、马匹的北周汉人商队与深目高鼻的西域商队,



再现了中外商队相遇的场景,印证着丝路贸易的繁荣。

北魏平城的文明互鉴印记

如果说汉代和唐代丝绸之路的东端是长安、洛阳,那么北魏丝绸之路的东端,便是平城。通过这条道路,西域各国使节、僧侣、商人、移民源源不断地向平城输入各类珍宝、香料、农作物等特产。

在大同北魏遗址与墓葬中,考古工作者们发现大量精美的西域金银器与玻璃器。最引人注目的是封和突墓出土的狩猎纹鎏金银盘。这件银盘以锤揲法将主题图像制为浅浮雕,画面中狩猎者深目、高鼻、长髯,头戴椭圆形头饰,颈部佩戴戴珠纹项圈,双手持矛刺向野猪前额,同时回望身后,单腿抬起以御野猪靠近。相似的狩猎图银盘在波斯萨珊王朝非常流行,封和突墓中出土的银盘应是来自这一地区。

北魏时期,西域玻璃器亦为备受珍视的外来器物。《洛阳伽蓝记》曾记载河间王元琛“常会宗室,陈诸宝器”,酒器中便有“水晶杯、玛瑙杯、琉璃杯、赤玉卮数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无,皆从西域而来”。《北史·西域传》记载大月氏人善于制作琉璃器,曾在平城采矿、制作。这样的技术交流深深影响着当地工匠,发展出与汉代以来仿玉玻璃完全不同的玻璃制品:汉代玻璃多用铸造法,追求玉器般的色泽;北魏玻璃多用吹制法,追求透亮之美。

随着5世纪北魏国力的强盛,西域各国使者、僧侣、商人、工匠及其亲属沿丝绸之路到达平城。他们和汉、鲜卑等民族共同发展了这一地区的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各种文化碰撞融合、相得益彰。丝路上穿梭往来的商队和使团不仅带动了商业贸易的繁荣,更带来了物质、思想、艺术、技术的交流,在塑造北魏多元一统的文化面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云冈石窟第16-1窟的西域商队图,正是这段历史的生动注脚。

(作者为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教授)

本版责编:王佳可 庄雪雅 陈熙芮 电子信箱:rmbgjf@peopledaily.cn 版式设计:蔡华伟

通古今之变 促文明互鉴

贺方斐

不可或缺的意义。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教授刘小枫在主题发言中提到,中国战国时代晚期就已出现“古今之辨”:一种观点认为“古今异情”,即古代与当代遵循的“道理”不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无论生活方式上存在多大差异,最基本的德性原则“古今为一”。类似的争议在古希腊罗马时代也曾发生。由此可见,中西先贤都相信,天下有古今不变之“道”,这在西方哲学中被称为永恒不变的“自然正当”。

在任何时代,德性生活都是政治生活的根基。“古今为一”意味着无论科技如何发展,世界怎样变化,人类追求德性的品质永恒不变。因而,认识到人类灵魂深处对完整美德的追求,引导卓越之士追求高贵,教育民众追求有德,是亘古不变的政治原则。

此外,中国和古希腊先哲也认识到,人要懂得自我“节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将明智视为最高的实践德性,孔子也提倡持守中道,这些思想反映出人类共通智慧品格,对启示、指导人类化解现代社会的各类挑战有着重要意义。例如,人工智能、生物工程等科技进步的确给生活带来诸多益处,但不加节制地应用可能引发不堪想象的生存危机。通过古典教育恢复对古代智慧的记忆,让科技思维及其实践行为受到必要约束,可谓人类在自我完善过程中不可省略的步骤。

古典学大会架起两座桥梁

在世界古典学大会闭幕发言环节,来自中国、意大利、美国和法国的4位学者不约而同地称赞,这次会议架起两座桥梁:

第一座桥梁是“通古今之变”。这是我国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提出的史学观念,主张正确看待世间种种变迁。中华文明递嬗演进,“通古今之变”的文明观持续激励汉代以来的中华古籍学者为赓续民族文明传统注入精神动力,继而启发今天的中国古典学追求“兼通中西之学,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

现代文明起源于欧洲。17世纪末,巴黎和伦敦学界相继出现“古今之争”:崇今派并不服膺于古人的精神,崇古派则敬重并热爱古典智慧。两派

是否珍视古典精神产生根本分歧,争论至今未能烟消云散。如何化解“古今之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历史性难题。

在全球化时代,“通古今之变”的文明观启示我们既不崇古抑今,也不崇今抑古,而是要贯通古今,追求和谐、秩序、有德性的生活。这为全球古典学提供一种理性看待“古今之变”的态度,古典学亦成为一座沟通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桥梁。

第二座桥梁是“文明互鉴”。回顾人类历史,古典文明形态多种多样,形成时间先后不一。阿拉伯文明兴起于7世纪,随后出现了持续两个多世纪的“翻译运动”,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吸取先进文化遗产。翻译运动的学术成果成为后来西方重新寻回古希腊典籍的重要路径之一。俄罗斯文明兴起于中世纪后期,曾主动继承拜占庭帝国的希腊文明统绪。西欧的新教文明形成于近代初期,主动寻求与古罗马文明的血脉联系。在后来的演进过程中,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俄罗斯文明与其他或先或后出现的文明一样,都形成各自鲜明的特性,却不妨碍它们找到共同的道德关切和精神立场。此次全球性的古典学聚会就为不同文明间交流对话,加深理解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一代代人创造的文化累积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性格,重读古典是一场回溯。回溯文明脉络,促进文明互鉴、推动文明发展,我们期待着古典学以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开启人类美好生活的崭新局面。

(作者为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古典学研究会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古典学研究室负责人)

2000多年前,地中海碧波荡漾,古希腊先哲激辩纵横,闪烁智慧的光芒;亚欧大陆另一端,黄河汹涌澎湃,先秦诸子百家争鸣,迸发思想的火花……不同古典文明如熠熠星辰,在历史长河中相映生辉,映照人类文明的壮丽画卷,滋养启迪后人。

11月6日至8日,由中国和希腊共同主办的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大会以“古典文明与现代世界”为主题,引发国内外学界对古典学的热议,令人们萌生对古典学的兴趣。

从“小古典学”到“大古典学”

古典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西方以古希腊罗马传世文献的整理研究和义理阐发为核心,它的支撑性学科包括古典语言学、文献学、古代史和考古学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古希腊罗马哲学。

古典学虽是外来词,中国却自古便有了类似学问,我们称为“国学”,西方学界叫作“汉学”。早在汉代,中国学者就已对先秦文献进行篇章追溯、音训考索、文本编辑、版本辨别等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就古传经典数量、思想之深邃以及学术体系之完备程度而言,中国先秦古典之学与古希腊罗马之学各有千秋,都是文明源头的瑰宝。

经过延续数千年的中世纪,西方对于古希腊罗马之学的传承基本中断,直至14世纪才开始寻求“复兴”。与此不同,我国自汉代建立起来的古典学体系既因时损益,又一以贯之。面对19世纪末欧洲现代文明的挑战,我国传统学问为自我保存而改称“国学”。17世纪时,来华传教士将中国经典之学带到西方,令欧洲学者深感钦佩,“汉学”研究开始形成。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成功举行,是全球化时代的文明盛事。19世纪初,现代大学体系开始形成,古典学在西方成为一门建制性学科,其研究视域集中在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700年左右的地中海文明带。本次大会首次让古典学走出西方,从全球文明发展的整体视野看待人类古典文明的历史脉络。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瓦列里·彼得罗夫认为,这次大会对促进世界各大传统文明间的沟通交流、推动古典学走出地域限制意义深远。德国慕尼黑大学汉学研究所所长叶翰、美国哈佛大学古典学系教授格雷

古典学对当今世界意义重大

当前,人类步入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古传经典及其蕴含的古老智慧仍对人们追求美好生活有着

戈里·纳吉和希腊雅典科学院文学与艺术部院士马诺利斯·科雷斯都在发言中指出,人类历史上并非只有一种古典传统,世界各地有着各自的古典传统,它们共同构成世界古典学的大家庭。因而,从全球古代文明视域出发,古典学研究不能仅限于古希腊罗马典籍研究的“小古典学”,而是要迈人面向全人类古典文明研究的“大古典学”。

遇见大唐风华

11月18日,“中国·唐——一个多元开放的朝代(7至10世纪)”在位于巴黎的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汇集中国10个省区市32家文博机构的200余件(套)文物,包括金银器、陶俑、织物、壁画、石像、书画等,从都城建制、社会制度、宗教传播、文学艺术、丝路发展等方面再现盛唐气象。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3月3日。(本报记者尚凯元文)

左图:一名游客拍摄彩绘男装女俑。右图:法国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以上图片均为本报记者尚凯元摄。下图:唐三彩骑驼奏乐俑。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供图

